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的定义及其学科归属

春秋战国的政治辩证法思想，是指这一时期对政治现象中的辩证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认识与实际运用的主张。它主要是对政治领域的矛盾统一关系的认识，是普遍性意义比较强的政治哲理和政治智慧中的精华。它比哲学辩证法要具体，比一般政治思想更深刻、更富于哲理。以上定义，不是简单地通过演绎推理而形成的，它主要是来源于对春秋战国有关思想史料的分析和概括，这从后面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论述的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中可以得到印证。

春秋战国的政治辩证法思想，是对此一时期政治现象的普遍规律的认识及其运用的主张，因而它本身显然是属于政治学中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范畴。但是，当分析、研究其与哲学思想的关系时，这种研究成果就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也就是具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交叉研究的性质。此外，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关于政治现象普遍规律的认识，是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因此，春秋战国的政治辨证法思想，应该是属于中国政治哲学史的范畴。

第二节　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的历史来源、发展及其主要内容

根据先秦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在夏末商初时，已经有了辩证性政治思想的萌芽。《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篇指出，商汤灭夏，是在观察到“桀为无道”（即为政残暴，生活荒淫），“凌轹（欺凌）诸侯，以及兆民”，“众庶（广大民众）泯泯（泯，是灭、尽的意思，此处是忧困的意思），皆有远志”（叛离的想法），“大臣同患，弗周（不和于桀）而畔（叛）”，“上下相疾（怨恨），民心积怨”等夏朝上（指夏王）下内外政治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才发兵攻夏的。这里已经涉及观察分析政治矛盾，以及在对方内外政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敌我政治力量的强弱转化问题。如果说有关夏末商初的记载不完全可靠的话，那么有关商末周初的辩证性政治思想的文献

材料则比较可靠。根据司马迁来源于先秦史料的《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武王在战胜商封王之后，“封商封子禄父殷之馀（余）民”，“为殷初定未集（未安定），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周文王的庶子）释箕子（商封王之叔，被封囚禁）。命毕公（周开国时期的重臣）释百姓之囚，……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这些政策措施中，就包含了对敌对势力的分化安抚与控制相结合，争取敌国的有识之士，争取敌国民众拥护的辩证性政治思想。

夏末商初和商末周初开始萌芽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因素，在春秋时期开始了向多方面的发展。这在《左传》、《国语》、《论语》等古籍中有比较可靠的记载。到了战国时期，早期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因素，已经从点滴、直观、片断性的言论或者政策性主张发展为各具特色的诸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出现了不少集中阐述某一政治辩证法问题的专门篇章，如《管子·形势解》篇，《荀子·王制》篇，《吕氏春秋》的《谕大》、《顺民》篇等。概括起来看，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所涉及的政治领域的矛盾关系和辩证范畴主要有：君与民、君与臣、官与民、贵与贱、愚与圣、圣与盗；取和予、利下（民）与顺上、利与害、损与益、惠民（富民）与教民、国富与贫治(《商君书·去强》篇这一对范畴的意思是，把富裕的国家当作贫穷的国家来治理会使国家更加富裕）；盛与衰、强与弱、治与乱、安与危、存与亡、忧患与安乐、善恶与福祸（积与变）；刚与柔、文与武、开与塞、赏与罚、宽与猛、德与刑、爱与威、罚与亲、严与利、教与罚、善德与善力、正己与正人、修己与治人、群与

分、分与和、齐与非齐、尚贤与任法、治约与治详、任贤与服民（安众）、屈与伸、信与权；无为与有为、争与不争、斗与服、和与同、同与异、否与可；变与常、因与革、乘势与待时；战争与政治、内忧与外患、内政与外事（外战）等。上述政治辩证法思想中比较重要的是：

1.关于统治者与民众相互关系的辩证性认识。(1) 已经意识到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依赖关系。最典型的表达是综合并发展了前人思想的《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篇的论述，即“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贵贱,交相为恃,然后皆得其乐”。《国语》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国语·周语·内史过论晋惠公无后》篇就指出：“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句中的“后”是指君王，“元”是善的意思。全句强调的是君王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逸周书·周书序》中也有相同的思想。此篇认为，“民非后罔乂（治理，即民众如果没有君王，就会乱而得不到治理），后非民罔与为邦（君王离开民众，就没有自己的国家）”。需要说明的是，不管《逸周书·周书序》成文于何时，其上述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可以肯定的。《管子·禁藏》篇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条件，即“主（指君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2) 认为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在政治行为上是一种相互对应的，具有转化性质的互仁、互德、互善或者是互争、互斗、互恶的关系。《国语·晋语·重耳逆怀赢》篇指出：“将有请于人，必先有人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孟子·梁

惠王》下篇将上述思想发展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管子·形势解》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辩证性政治哲学的概括，即“主苛而无厚则万民不附”；“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贵显而子孙被其泽。……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伤而子孙蒙其祸”；“上施厚，则民之报上亦厚；上施薄，则民之报上亦薄。……故曰：往者不至，来者不极”（不极是与不至相对应的不到的意思）。(3) 揭示了利益趋向是决定统治者与民众关系好坏及其转化的条件。就是说统治者利民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和支持，反之就会失去这种拥戴和支持，使自己与民众处于严重的矛盾冲突状态。随着利害关系的变化，上述两种情况可以互相转化。《国语·周语·刘康公论俭与侈》篇指出：“惠（用实际利益）以和民则阜（生长）。若本固而功成，施遍而民阜，乃可以长保民矣，其何事不彻（通、行）？”《国语·周语·单穆公谏铸大钱》篇说：“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将民之与处（归附和拥戴）而离之，……则何以经国？”《荀子·正论》篇指出：“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管子·形势解》篇也认识到，“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叛离）”；《管子·版法解》指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支持他）；擅（独揽）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六韬·武韬·发启》篇认为，“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

2，关于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关系的辩证性认识。其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心是认为君臣上下之间，应该是一种同中有异或者是否与可相统一的关系。(1) 君王等执政者应该听取臣民和众人与自己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子产的有关思想，即“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中的史料，晏子针对齐景公“和”与“同”不分的情况，全面地阐述了政治上“和而不同”的思想。晏子认为，君臣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即“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在这一论述中，臣与君在政治见解上的可与否的矛盾统一思想（“和”）非常明显。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也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韩非子·内储说七术》篇在吸取惠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决策如果不听取反对性意见，就不能了解到全面的情况，就失去了一半的智慧，就处于“半塞”的状态。《管子·形势解》篇也提出，“主恶谏则不安”。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之所以主张统治者听取不同以至相反的意见，其理论基础在子产发表反对毁乡校的上述言论时就已经涉及，就是认为这样做可以疏导政治矛盾，防止矛盾的积累，实现政治统治的稳定。即“我闻忠善（指虚心听取好的意见）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然犹防川（不准发表反对意见如同堵塞江河），大决（冲毁堤坝）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不能）救也。不如小决使道（疏导）。不如吾闻而药（治、改）之也”。此外，晏子在论述“和而不同”的思想时，还涉及了君王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的问题。(2) 君王或者执政者在用人上应该是

像齐桓公用曾经射伤他的管子那样，任贤不记仇。实际上是主张用人也要同中有异，或者是包容相异的方面。《国语·晋语·赵宣子论比党》认为，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下属对上司“犯而不隐，义也”。赵宣子还认为，有才干而冒犯了他的韩厥可以“临长晋国”。任贤不记仇的思想，除了具有为图强争霸服务的性质以外，还着眼于调和与化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国语·晋语·臼季举冀缺》（冀缺是试图谋杀晋文公的冀芮的儿子）就提出，“国之良也,灭其前恶”。《老子》第七十九章也有相关的论述，即“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比喻有根据有理由），而不责于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3) 认为统治阶级内部或者君臣上下之间，在政治上也是一种具有同一和转化性质的对应关系。春秋时期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到了战国时期，上述思想发展为更全面的理论。最典型、最形象的是《孟子·离娄》下篇中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管子·形势解》篇也认为：“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

3.关于国内外政治关系上的内政决定外事、外战，外事、外战也影响内政，以及运用这种辩证性认识去处理国内外政治矛盾关系的主张。这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比较全面和比较集中的论述。《国语·晋语》中前后相连的《范文子不欲争郑》、《范文子不欲与楚战》、《范文子论胜楚必有内忧》、《范文子论德福》、《范文子论私难》五篇中就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其主要思想是：“内和而外

威”，“能内睦而后图外，不睦内而图外，必有内争，盗（何不）姑（暂且）谋睦乎”！“凡诸侯，难之本也。且唯圣人能无外患又无内忧，讵（既）非圣人，不有外患，必有内忧，盍姑释荆（楚）与郑以为外患乎！诸臣之内相与，必将辑睦。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将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其产将害大，盍姑无战乎”？范文子对不与楚战，留外患以促内睦还另有具体条件的分析。在《左传·成公十六年》中，范文子指出，“吾先君之亟战”，是因为“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盗释楚以为外惧乎”？在《左传·成公十七年》中，范文子又指出，“君骄侈而克敌，……难（祸）将作矣”！在范文子之后，关于内政与外战、外事相互关系的辩证性思想，又有许多新的补充和发展。如《孙子兵法·军形》篇的“善用兵者，修道（指统治之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帛书《老子·德经》（乙本）中的“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琛（宝）矣”。《孟子·告子》下篇中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孙膑兵法·[见威王]》篇中的“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

第三节　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与其各自哲学倾向的关系

1.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的提出，多半具有无神论倾向或者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例如，晏子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就与其无神论倾向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左

传·昭公二十年》中的史料，晏子认为，祝史求神保佑君主，只是对“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的“有德之君”有用处，而对“暴虐淫从，肆行非度”，使“上下怨疾”、“民人苦病”的无德之君没有用处。晏子还指出：“祝有益也，诅（即求神加祸）亦有损。聊、摄（均地名）以东，姑、尤（均为江河名）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祝史）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在这里，晏子实际上否定了有意志的、能够决定君主安危的鬼神的存在，认为君主的安泰与否，取决于与民众的关系，取决于自己的德行，而不是取决于求神保佑的迷信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晏子关于臣与君在政治见解上的可与否的矛盾统一思想，也是在这一年提出的。《老子》关于“唯施是畏”，“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等多方面的政治辩证法思想，与此书第六十章中的“以道莅（统治）天下，其鬼不神”的论述，也有密切的关系。《管子·形势解》篇关于“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恶”的辩证性政治思想，与篇中的“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祭祀用的牲畜）珪璧（珪、璧是两种形状不同的玉器）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的无神论倾向有直接关系。《荀子·天论》篇的“有后无先，则群（聚）众无门；有诎（针对老子的贵柔、谦下）无信（伸），则贵贱不分；有齐无畸（不整齐，实际上是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则政令不施；有少无多，则群众不化”等论述，以至荀子多方面的政治辩证法思想，都与此篇的“天不能祸”、“祆（妖）怪不能使之凶”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有直接关系。《韩非子·

储说七术》中的“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雍塞”等听取不同以至反对性意见的论述，以及多方面的政治辩证法思想，都明显地与其《显学》篇关于理论要有事实的“参验”，“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的唯物主义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春秋战国的政治辩证法思想，之所以多半具有无神论或者唯物主义思想倾向，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认识和理论的前提。显然，如果认为鬼神上帝或者有意志的天，是政权得失、政治祸福、兴衰安危的决定性力量，就很难把注意力放到分析和重视现实政治中的矛盾与辩证关系上来，也很难做到正确地总结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只有把对政治的支配性力量的分析，从鬼神上帝和上天那里，回到现实社会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中来，也就是回到对统治者与民众以及统治者内部等现实关系的分析中来，才能比较深刻地揭示和总结概括其中的矛盾及其辩证关系，才能自觉地运用对政治现象的辩证性认识，去处理政治关系和政治矛盾。

2.春秋战国的政治辩证法思想，一般都有其哲学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同时，它也为哲学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中的思想史料，晏子和孔子的辩证性政治思想，都是以其辩证性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晏子关于臣与君在政治见解上的可与否的矛盾统一思想，是以其同时所说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的矛盾统一的朴素哲学辩证法为基础的。而孔子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宽猛相济、“不刚不柔”的辩证性政治思想，则是以他同时所说的两种性质相反

的东西“平之以和”的哲学辩证法思想因素为论证根据的。《老子》的“唯施是畏”“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将欲废之,必固兴之”等各种政治辩证法思想,无一不是以第四十章的“反者,道之动”的哲学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管子·枢言》篇的“卑者,尊之充也;贱者,贵之充也”等辩证性政治思想,也是直接地以篇中的“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的哲学辩证法为理论前提的。《墨子·大取》篇关于“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等辩证性决策思想,与篇中哲学性的辩证性同异观有关连。《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谓起贾》中“古之为利者养人”的辩证性政治思想,明显地是以篇中“察于见反,故能制天下”的哲学辩证法为理论依据。《荀子·正名》篇主张把满足欲望与节制欲望统一起来等等政治辩证法思想,与其《解蔽》篇的反对片面性,认为心能够同时兼知相异乃至相反的事物的认识辩证法有密切的关系。《韩非子·八说》中的“仁暴者,皆亡国者也”,以及其他篇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都与其具有矛盾统一性质的“理”的概念,有思维逻辑上的关联。从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的竹简《文子》中的“积怨成亡,积德成王”等辩证性政治思想,显然是以其“天之道也,不积而成者寡矣”的哲学辩证法为理论根据的。

春秋战国的政治辩证法思想,之所以一般都有其哲学辩证法的理论基础,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两者在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思维结构上有共同之处。掌握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辩证法,有助于认识和论述具有特殊性质的政治辩证法。实际上,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一部分的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的论述，与阐述其辩证性的哲学观念，在逻辑、语句和章节安排上都有明显的关连。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的政治辩证法，也为哲学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例如，在《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篇中，为论证“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的辩证性政治思想，提出了“不为者，所以为之也。此之谓以阳召[阴],以阴召[阳]。东海之极,水至而反 夏热之下,化而为寒。故[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 至精无[为],而万物以化”。在这里,具有以此一辩证性政治思想为概括的起点，进一步扩大范围并抽象概括、推演为辩证性哲学思想的性质。从理论上看，春秋战国的政治辩证法与军事辩证法和朴素的自然辩证法一样，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若干具体辩证法中比较重要的一种，作为概括各种具体辩证法而形成的哲学辩证法，必然要吸取和抽象概括政治辩证法的思想材料。

第四节　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

1.学术和理论意义。(1) 由于此一课题过去只是多方面有所涉及，而没有进行过专门的深入系统研究和相关分析，因此其研究成果可以补充、拓展和深化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并发掘出一些现代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哲学的发展中仍然应该吸取和借鉴的思想内容。(2) 同时，也可以为尚未形成的政治辩证法基本原理提供思想材料，还可以为当代政治哲学理论以至政治学原

理的研究和编著提供一些新的补充性材料或者借鉴性的东西。政治学原理应该努力反映政治领域的一般规律，而政治辩证法属于对政治领域的普遍规律的认识。作为特殊性质的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也包含了一些可以吸取或者可以借鉴的关于一般政治规律的认识。（3）对尚未进行的中外政治辩证法思想史（断代史、通史、国别史）的研究，或许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4）系统分析和总结独特而且仍然具有一定合理性、科学性的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可以提高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在世界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有助于人们全面、深刻、科学地认识和发扬中国古代的优秀思想文化。

2.实践意义。春秋战国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对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内不同层次以及国内外相互之间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的稳定，科学地进行政治决策，正确制定或者是不断完善以及论证和理解政治方略，提高党政干部包括军队政治干部的政治思维能力，都有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第五节　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方法

由其学科性质所决定，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其特点。

1.其思想史料的调查和发掘范围应该比较广泛。（1）其研究材料的搜集，不但要注意这一时期政治思想方面的文献，还要注意哲学方面的文献。如《荀子·天论》篇，是哲学性的著作，但其中也包含了“有齐无畸，

政令不施”等政治辩证法思想。《韩非子·解老》篇，主要是阐述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看法，但其中也包含了具有法家特色的“万事必有驰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这样的政治辩证法思想。（2）发掘这方面的思想史料，应该研究具有综合性质的史籍。除了《左传》和《国语》以外，其他史籍中也有政治辩证法思想材料。如《逸周书·王佩》篇的“德在利民，民在顺上”“福在受谏”“安民在知过”等。《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于安思危，危则虑安”等。（3）全面发掘这方面的思想史料，还应该注意这一时期的兵书。如《孙子兵法·九变》篇关于“将受命于君”与“君命有所不受”、“屈诸侯者以害”与“趋（指引导、吸引）诸侯者以利”相统一的思想。《司马法·仁本》篇的“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天子之义》篇的“礼与法，表与里，文与武，左右也”，等等。（4）还应该注意具有文学性质或者文学色彩的文献。春秋战国时期这方面的文献，本身就具有思想性，同时还包含一些确有其事的思想史料。比如《国语》中有关政治辩证法思想的论述，有11处引用了《诗经》。而《晏子春秋》除了包含见之于《左传》的晏子本人的思想以外，其他流传和作者虚构的有关政治辩证法言论，也很有思想价值。至于《晏子春秋》应成书于先秦，笔者已依据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等文献，作了专文考证，并已发表在《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2.除了运用政治学方法以外，还应该运用哲学方法。春秋战国有没有不同于哲学辩证法的政治辩证法？所分

析和概括的政治辩证法思想是否生拉硬套？要解决上述疑问，就必须同时运用政治学方法和哲学方法。运用政治学方法，最主要的是在思想史料的选择和分析上，把握好确实是政治学范围内的思想、概念和理论。而运用哲学方法，除了着眼于揭示政治现象、政治概念、政治范畴的辩证关系外，它同时也是论证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确实存在的需要。因为，当着某一政治辩证法思想，有其哲学辩证法的理论基础，或者与之有着直接和密切关连的时候，那么它的存在就有其必然性，就不会被认为是人为地拼凑、拉配和拔高。

3.借鉴系统论的方法。就是从研究对象本身的哲学、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思想的相互关系和整体中，从其本身的思想、所属学派、不同学派几个层次的相互关系和整体的系统中，从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其变化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动态关系中，来科学地分析、把握和评价其政治辩证法思想。例如，整体性地研究某一政治辩证法思想与其自身的其他思想的关系、对同一学派有关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历史影响、对其他学派的批评或者吸取和综合等问题，就具有借鉴系统论方法的性质。这种方法的运用，对于战国中后期的有关研究显得特别重要。战国中后期政治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与各学派内部、各学派之间在继续分化的同时，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吸取和渗透，以至在一定思想主导下对各家学说的综合有相当的关系。例如，《荀子·解蔽》篇中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德），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智）”，以及《荀子·天论》中的“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

见于诎,无见于信(伸)”;“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等论述，都是在对各派学说的批判中，蕴含和形成了（其中有吸取、综合的成分）荀子所具有的对立统一性质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如果不进行系统的分析，就难于准确地把握其批判对象的原意，也难于恰如其分地评价荀子本人要表达的思想。

上编

春秋时期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